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美) 道格拉斯·C·诺思著
- 陈郁 罗华平等译
-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1

根据美国 W. W. 诺顿出版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主 编 陈 昕
责任编辑 俞顺英
封面设计 宋珍妮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美〕道格拉斯·C·诺思 著
陈 郁、罗华平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89000

印数 1—3500

ISBN 7-5426-0477-5/F·98

定价: 6.50 元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陈昕主编



序 言

本书的目的是为分析经济史实提供一个新的框架。由于经济史学家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能解决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即既要解释清楚决定和衡量一种经济体系实绩的制度结构，又要解释这种制度结构的变迁，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发展一种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本书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所包含的一些要素，但肯定不是全部的。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基于贸易生利这一牢固信念而构造了他们的模型。专业化与劳动分工是《国富论》的核心问题。然而，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这些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因而本书的理论框架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交叉，并探讨了作为制度变迁基本要素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这样，本书的读者不仅限于经济史学家，

而是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因此我尽量少用技术性的经济学术语。虽然在第1章我用标准的经济学术语来提出问题，但在这里和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一直努力使非经济工作者能理解我的观点。

我在第1篇提出的理论旨在将大部分经济史实重新置于一个新的模型中。在第2篇有关从农业的起源到20世纪这1万年的西方经济史的章节中，我也正是这样做的。为了确保探讨如此漫长的经济史所应具有客观公正性，在解释经济史实之前，需要一个概念基础。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并没有超过我们所运用的理论，而不幸的是这种理论存在着缺陷。本书的理论及随后的历史分析将提供一个系统考察和检验新假设的基础，我们将根据这些新的假设去寻找新的证据，结果可能会修正甚至推翻原先的假设。

为使认识不断深化，理论必须能被证伪，即对理论既可以根据研究中包含的假设直接进行验证，也可以根据从论点中推出的逻辑性假设间接进行检验。由于不可能明确验证有关经济史实的各种解释，所以我们希望各种与我们相对立的解释能够继续存在，并被应用于各种各样互不一致的现行政策药方中。然而，我将提出一个现实的而不是令人绝望的意见：如果我们相信有可能对过去给

出唯一的一个科学解释，那简直是在自欺欺人，但我们现在未能说服别人相信我们得出的有关经济史的规律，原因是我们没有朝这个目标努力；不断坚持寻找可证性假设和证据通常能够逐步减少各种相对立的解释；我们决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达到一致的认识，但对某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取得一致性认识，而对其他一些问题我们会缩小各种解释之间的差异。

本书是对制度变迁研究的继续。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始于1971年我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的增长》，以及1973年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我不仅从我早期研究的两位合作者那里，而且从一些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及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受益匪浅。这里，我要特别感谢4位背景不同的读者，他们对我的全部手稿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详细的意见。他们是：乔治·本特森、斯坦利·埃格曼、玛格丽特·利瓦伊和曼库·奥尔森。此外，我对交易费用和经济组织的理解主要归功于我的同事张五常。

华盛顿大学的其他同事也对我的部分研究成果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他们是：约翰·巴泽尔、阿瑟·费里尔、迈克尔·赫克特、保罗·海恩、罗伯特·希格斯、莱维斯·科钦、

卡罗尔·托马斯和迪安·武斯特。

我已将本书稿的各个部分在一些大学和几次会议上让大家评价，而且我还把一些章节寄送给其他大学的人去评论。摩西·阿布拉摩维茨、阿尔曼·阿尔奇安、罗伊·巴特里奥、里卡多·比恩、卡尔·达尔曼、维克多·戈德伯格、乔纳森·休斯、查尔斯·普洛特、加斯顿·里明格、汤姆·萨文、西奥多·舒尔茨、弗农·史密斯、戈登·图洛克、伯顿·威斯伯德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他们都给我提出了特别有用的建议。但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同行及有助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会议。

伊丽莎白·凯茜编辑了全部手稿，在此过程中她促使我理清了几乎每一页的思路。

道格拉斯·C·诺思

1980年8月于密执安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社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 当代经济学文库；(2) 当代经济学译库；(3) 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 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通用教

材，“新知文丛”则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的话

1973年，美国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该书与其说是对经济史进行细致缜密研究的专著，还不如说是一部洋洋洒洒、高屋建瓴的史论。尽管该书篇幅不大，也没有在经济史的数量研究方面提出新的具体成果，但它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因为它为经济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根基于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用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去重新解释历史。该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

诺思，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2年和1952年分别获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博士学位，1946年至1982年间曾先后任教于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赖斯大学和剑桥大学。1982年，他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教，在该

校经济系任亨利·R·卢斯讲座法律与自由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东部经济协会会长、经济史协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

《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出版可谓是一“书”激起千层浪。不过，这篇史论更注重的是史——历史的史实，而诺思教授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则更注重论——历史的理论。在后一本书中，他不仅对自己在前一本书中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完善，而且还进行了理论总结，由此提出了在新经济史学派中独执牛耳、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触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

1

长期以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直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经济史的作品不论是采取编年史法还是采取主题叙述法，都往往是材料的堆砌和罗列。经济史就像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史、法律史和技术史等）一样，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研究领域不同而已，而没有表现出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和不够先进的。如果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大家、里手都是“哲

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和历史观，都从自己的角度和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那么，经济学家理应用自己的学术武器——经济理论——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何况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一种较为严密和有效分析问题的方法。^①诺思教授和以其为代表的经济史学派正是这样做的。经济史学的兴起一下子改变了经济史学本身的历史，从此经济史学家才真正开始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理论与历史被溶于一炉。这一进步在经济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不仅经济理论的应用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而且理论应用还导致了一系列发人深省、与传统观点迥异的结论。无疑，这是一场革命。

正如任何一场学术革命都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革命，经济史学中的这场革命的缘起，便依赖于理论经济学最近一次的革命——“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宏观经济学以及由此而后形成并完善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所有这些都成为经济史学家分

^① 以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用经济理论成功地分析、研究了政治活动中的许多问题，布坎南本人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为明证。

析经济史的强有力工具，而传统的经济史学研究方法是无法与此相比的。最起码，这些理论方法能对以往的统计资料重新进行分析、研究。基于此，在新经济史学革命的诞生地——有关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诺思教授一反传统，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经济计量法等），首先对1790—1860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由此被认为是对其他经济史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是采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方法改写美国经济史的一项杰出成就，同时也是重新编写美国经济史的开端。这以后，诺思教授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模型，这项成果集中体现在《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1961年）一书中。为此，诺思教授曾自豪地说：“在美国经济史中正进行着一场革命。这是由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发起的。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解释。他们确信，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实的基础。”^①

当然，对经济增长因素的重新核算必然引发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究，诺思教授也不

^① Douglass C. Nor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III, No. 1, Part I (1963).

例外，何况，经济增长问题在新经济史学派兴起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是经济研究的热门课题。不过，诺思教授没有去完善凯恩斯主义式的增长模型，而是独辟蹊径，力求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物质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了呢？显然不能，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反例。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诺思教授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

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使得诺思教授的这篇论文不仅成为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而且也启迪他从此以后就制度变迁这一课题进行深层的、全面的和理论的、历史的研究。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只不过在方法上为诺思教授对历史材料进行实证性分析提供便利的话，那么，新古典理论则在理论上为他对历史分析进行规范性归纳提供了“哲学”基础。换言之，在诺思教授的新经济史学中，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仅仅是工具而已，而其理论的“精髓”则是新古典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和理论规范。这在诺思教授以后对制度变迁的一系列研究中是昭然若揭的。

2

任何一种建立理论的念头尽管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或对历史素材的分析中的若干思想火花，但被建立的这种理论本身必须首先解决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被研究对象运动原则和机制问题等，也就是说，免不了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诺思

教授建立制度变迁理论的起点就是系统阐述了有关制度的原则和过程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具体作品就是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与兰斯·戴维斯合著）。就像一篇同名论文的副标题所示：这是走向制度创新理论的第一步。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狭隘性，即它们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而现在就是要冲破这种狭隘性去发展一种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

对于制度，在我们看来，它既然像诺思教授所论证的那样也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那么，它作为主体行为的结果的客观运动，与其他生产要素在某些方面，尤其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果不其然，诺思教授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多方面的定量研究，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可他们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在美国

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而同时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具体分为这样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从诺思教授有关制度变迁的这些基本立论中不难看出，其欲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与通常的经济增长理论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而后者将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和已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都以收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理论的起点。

值得指出的是，诺思教授在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仅归纳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而且还多次考察了美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产权含义，即制度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关系。产权理论的盛行及其完善，为他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释西方经济的历史，即理论由“抽象”到“具体”创造了学术背景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诺思教授这项研究工作的纲领性和宣言性文献就是《西方世界